

杨殷与广州起义

□李淼翔

杨殷是广东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广东党组织遵照中央的指示，于1927年8月成立了中共广东省委，由张太雷任书记。杨殷是中共广东省委7名常委之一，并担任工委书记。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在广东成立了南方局，杨殷先是与张太雷、黄平3人组织临时南方局。同年10月，南方局改组，杨殷仍是6名南方局主要成员之一，并与张太雷等6人组成南方局军事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首先发动和组织了全省的秋收起义。随后，广东省委又直接领导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杨殷作为中共广东省委和南方局的领导成员之一，直接参与组织和发动了广州起义，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参与起义的酝酿和筹划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开始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四一五事变后转移至香港的广东省委，于1927年10月15日在香港召开了省委和南方局联席会议。作为省委和南方局的领导成员，杨殷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分析了广东当时的政治形势，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决定在广东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决不能因叶贺军队之失败而取消之”，而“应继续实现”，并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

为了实施起义计划，会议前后，省委先后派人到全省各地部署指导。11月上旬，杨殷代表省委前往海南，出席了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杨殷传达了南方局和省委关于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指示，指导会议制定了新的军事计划，决定扩大琼崖各县武装暴动。

11月，广州起义的准备已进入紧张阶段。为了更好地部署起义，张太雷等省委主要领导都陆续回到了广州。根据省委的分工安排，杨殷与张善铭等人留守香港省委机关，直至起义前夕才返回广州。杨殷当时虽身在香港，但仍然为广州起义的举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筹备组织工作。12月初，杨殷回到广州后，更是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组织起义的准备工作中。

二、组织联络市内工人和市郊农民，建立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

“四一五”以后，广州许多工人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迫害，纷纷疏散回家乡隐蔽，或逃亡港澳。杨殷首先将熟悉的李甫、李连、曾伟赞、黄寿等工人骨干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批秘密联络点，并通过他们将其他更多的工人串联起来。后来这些工人大都被编入了广州工人赤卫队，成为起义的重要骨干力量。起义前夕，杨殷更风尘仆仆地分别到各行业工人中作动员和鼓动工作，为起义的举行作最后的精心部署。杨殷还派遣梁复燃等人从香港返回南海，传达省委的指示，将南海农民武装组编成两个团。起义前，杨殷亲自参加了战前会议，对这支农民武装在起义中的行动方案作了具体指导。起义中，南海农军先后攻克了大沥镇和佛山市外围据点普君墟，并联合广州工人赤卫队打下了石围塘广三铁路车站。

三、负责起义文件等宣传资料的印刷和运送

起义前，杨殷就安排得力人员在香港、澳门两地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站，其目的一是接待来往人员、传递文件和交换情报；二是为广州起义文件等宣传资料的印刷、运送做准备。据杨广回忆，起义前省委为广州起义准备的宣言、文告、传单和省委机关刊物《红旗》，都是在香港由杨殷安排他把稿件秘密送往澳门印刷，然后带回香港省委机关。“为确保刊物安全，由杨殷交代来往香港澳门轮船上的海员负责接应。刊物都是经过伪装的，用红红绿绿的商业招纸包裹着，然后由我带上轮船，接应我的海员便把它放在轮机室或账房内。船泊香港，

待所有的旅客都上了岸，我才在海员的掩护下把《红旗》带到发行机关——一间故衣店的楼上。”最后，这些起义的文件和宣传资料也是杨殷通过海员接应运送回广州的。因此，起义一经打响，起义的各种宣传资料便迅速散发到广州全城的大街小巷，极大地壮大了起义的声势。

四、派人打入市公安局内部，作起义的内应

平时，杨殷就十分重视从敌人内部搜集情报的工作。在准备起义前，他就已派了党员黎胜打入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任“特别侦缉”。随后，黎胜按照他的指示把包括市公安局局长朱晖日的司机在内的一批汽车司机争取了过来。早在11月间，周文雍被捕入狱，就是杨殷通过市公安局的内应营救出来的，避免了起义前的重大损失。

起义开始后，黎胜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智取公安局门前的岗哨。起义部队攻入市公安局后，他又立即率领公安局的一批司机拿起缴来的武器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政治犯”。接着，司机们开着缴来的汽车又投入到攻打其他敌据点的战斗中。

五、夜以继日、全力以赴准备起义

12月初，杨殷根据省委的安排，从香港回到了广州。这时，起义的准备工作已进入了极为紧张的最后倒计时阶段。于是，杨殷便与张太雷等省委领导争分夺秒地投入到起义的最后部署中。

12月7日晚上，广州汽车工会在仙湖街太邱书院召开总动员会议，参加会议的司机代表有200多人。杨殷和张太雷、周文雍一起出席，号召全体汽车司机立即行动起来，准备起义。在他们的指导下，汽车工会作出了参加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

12月10日早上，杨殷在黄沙一间民房里主持召开了部分起义军领导骨干会议，传达了省委提前起义的决定和部署。与会人员磨拳擦掌，情绪十分激动。但也有人担心时间紧、武器又少。杨殷沉着坚定地说：“来得及。怎么来不及呢？刀柄还没有给他们抢去嘛！麻烦当然麻烦，甚至要准备闯险！准备失败！可是我们要是怕这些还要革命吗！……我们手里拿着‘天九至尊’，难道杀不倒他的‘三武鹅五’？”杨殷的风趣和乐观顿时令大家信心倍增。当天下午，杨殷又赶往禺山市场一间杂货店的二楼召开起义总指挥部参谋团军事会议。会上，他详细报告了已掌握的情报，并说已由他亲自派人前往各县通知提前行动。傍晚，为稳妥起见，他下到各赤卫队去作最后的巡视检查。晚上，他又赶到长寿路谭新街六号党的一个秘密机关与张太雷、周文雍等起义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落实起义的最后部署。

六、在指挥起义的岗位上

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的枪声终于打响了。起义军各部按照预定部署分别向各自的目标发起猛烈进攻。粤汉铁路工人武装执行杨殷的指示，先后攻占了粤汉铁路管理处和修元精台第十区警察第一分署，随后与该地区的工人赤卫队一起负责该地区及沿线铁路的巡逻警戒，维持治安秩序。

11日天亮前，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都已为起义军占领。早上6时，中国第一个大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原广州市公安局内成立，省委书记张太雷任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杨殷任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7时，广州苏维埃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宣言、文告和决议。下午，杨殷原定与其他起义领导人一起出席在第一公园（即人民公园）召开的拥护苏维埃大会，由于敌军进攻观音山，大会被迫改期举行。

12日中午，广东人民拥护苏维埃大会在丰宁路西瓜园如期举行，杨殷等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均到会，直至午后始行散会。会后，张太雷偕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乘车到前线指挥作战，途中遇敌袭击中弹牺牲。于是，起义形势急转直下。及后，杨殷接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主席

职务。

起义期间，杨殷除了有时在起义指挥部参与商议决策外，大部分时间都直接到前线巡视指挥，协调起义军各部（主要是西部各路起义军）协同作战，直至总指挥部作出撤退决定才率领部分工人赤卫队撤出广州。

七、起义后受到错误处分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央随即派李立三到广东，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工作并恢复中共广东省委。1928年1月1日至5日，在李立三主持下，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其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广州起义问题。会议在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过多地追究领导者个人的责任，采取了惩办主义的做法，对杨殷以及周文雍、叶挺、恽代英、陈郁等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均作出了“政治纪律处分”。对杨殷的处分则是“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未执行职务”，给予“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的处分。这处分，显然严重忽视了当时的客观现实，是当时在起义失败后部分人出于对起义组织者的不满和愤激而产生的急躁情绪的反映。三四月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亲自到香港处理此事。在省委的会议上，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出的革命精神，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强我弱，未能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又未及时撤退转移农村。同时宣布撤销原来省委对起义领导人的处分决定。

1928年6月党的六大以后，杨殷留在中央工作。在广州起义一周年之际，杨殷专门撰写了《斗争中的回忆》一文，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以作纪念。该文开篇写道：“这个伟大的举动，很快又是一年了，当此一年的纪念日，我把我能记忆的壮烈斗争各情形写出，做个追悼既往，策励将来的礼物。”该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记述了广州起义，尤其是广州工人在起义中浴血奋战的英勇壮举。在文章的最后，他希望：“现在只有更努力准备我们的力量，为被难的工友农友士兵复仇，为先烈遗留给我们的苏维埃口号而奋斗！铲除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建立我们的政权。”杨殷牺牲后，中共广东省委称赞他为“广州暴动的有力指导者”。应当说，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